

立志“振兴中医”的前卫生部长

“条子部长”

1982年,卫生部部长面临换届。几位副部长都是老革命、老资格,排名靠后的崔月犁显得云淡风轻,事不关己。但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,4月24日,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

崔月犁能够被任命为卫生部长的主要原因是他改革精神很足,是一个创业型干部。那时国家穷,底子薄,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很少,卫生口又很保守,要达成共识很难,必须找一个工作有魄力的改革派当家。崔月犁在北京市委工作多年,担任过彭真的政治秘书,善于把握大政方针,也了解基层情况,改革意愿强烈。

崔月犁接任部长后,卫生部正式开始改革试点。新的部党组决定,当年上半年不开会或少开会,各种学会也要少开。正副部长“轮流坐庄”,每人在部里主持全面工作一个月,其他人都下去调查研究。卫生部机关各业务司局也要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,由司局长带队,分赴城乡医疗一线。

为了推动全国医改,崔月犁还在北京选了协和医院(当时叫首都医院)、广安门中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作为试点,分别代表西医、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种不同类型。他告诉前来采访改革新风的记者:“每星期一、三、五,我在首都医院办公;每星期二、四、六,我在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办公,特殊情况例外。”他还常戴着口罩扮成病人坐在候诊室里,调查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态度。

他带着协和医院副院长苏萌去与

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沟通,想把医护人员的夜班费从7毛钱提高到一块钱。王丙乾说不行,协和医院改了全国都得改,财政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崔月犁说:“我这个卫生部长当得也太寒酸了,连一块钱的权力都没有。”王丙乾说:“这样吧,你们不要对外宣传,自己把夜班费提到一块钱。”崔月犁说:“偷偷摸摸这叫什么改革?我当这部长有什么用?”王丙乾终于同意了。

王玉山记得,崔月犁极其重视工作效率,有事绝不过夜。那时有些干部习惯于凡事形成文件,分头批阅,但崔月犁对这种“公文旅行”不以为然。他说:“不要一来就搞什么批文,能打电话、写条子解决的事就别发文了。”他习惯于直接批条子,被一些人称作“条子部长”。

“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”

在卫生部工作期间,崔月犁最受争议的是关于中西医结合。

崔月犁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后开始分管中医工作。“文革”前全国县以上中医院共有371所,到1978年只剩下170多所,现存的中医院也基本以西医为主导。面对中医的困境,卫生部是否应该继续执行多年来“西医在朝、中医在野”的政策?很多人劝崔月犁,对中医不要介入太深,但他没有听。

1982年4月,他策划和主持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,即中医发展史上颇有标志性意义的“衡阳会议”。他在会上作了《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》的讲话。他说,医疗界存在着认为中医不科学,对

中医或者采取清高和不介入,或者鄙视、歧视、不屑一顾,或者口头上赞许而实际行动上排斥的态度。这些思想用不着专门去批评它,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用事实来澄清。

就在衡阳会议的最后一天,传来了内部消息:崔月犁将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参会者纷纷说,看来“重西轻中”的局面真的要结束了。但也有人写了“紧急建议”,并以学术组织的名义向多位中央领导报送。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,研究卫生部党组在衡阳会议后上报的《关于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》,崔月犁列席了会议。会议决定,支持卫生部“开创新局面”。

衡阳会议后,他着手调整中医院“西医当家”的领导班子,改变“中西医结合”的办院方向,遭到很多人的抵制,但他坚持自己的做法。他认为,西医好比砖墙,中医好比土墙,在中医院里搞西医,土墙很快就会倒了;在西医院里搞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,则不会伤害到西医。他问,如果不先补上中医这块短板,西医跟谁结合?那只能是“一根针、一把草加上两片阿司匹林的中西医结合”。

当时卫生系统有人私下议论,说崔月犁过去是中医出身(他参加革命前曾在镇上的中医医院做了三年学徒),所以才格外重视中医。原卫生部部长值班室文秘王仙梅则认为,崔月犁从没有学过中医,也没做过中医,之所以要振兴和扶持中医,一是因为他常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,不能丢了;二是他常下基层调研,了解到中医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普遍

受到老百姓的欢迎;三是当时乡村缺医少药,而中医药价格低廉,老百姓更能接受,这是中国的国情。

外交部青睐的部长

崔月犁在卫生部饱受争议,但在外交部却大受欢迎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外交部经常从各部部长里“抓差”,轮流完成重要外事任务。崔月犁是最受外交部青睐的部长之一。

崔月犁天性喜欢交朋友,善于和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。当年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总是用“超常的联络能力和亲和力”来形容他。

1986年3月,崔月犁代表中国出席瑞典首相帕尔梅的葬礼。那次有一百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,各国代表依次致哀。排在崔月犁前面的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法国总统密特朗,他们的随行人员都只有一名秘书和一名翻译,而排在后面的苏联代表团有七十多人,让他深有感触。

回国后,他给胡耀邦写信,建议:“下去的负责同志不要带许多人,只需二三人陪着就挺好,老百姓也不会注意。声势大了,不利于了解情况。”胡耀邦对他的建议很欣赏,让秘书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,是否同意公开这封信和胡的批示,他欣然同意。

1998年1月22日早上,崔月犁洗漱完毕,等着秘书和司机来接他去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。他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,就让司机马上送他去医院。在路上,他的生命静静走到了尽头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宋春丹/文

尼克松:我如何策划了中国之行

《尼克松回忆录》是美国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,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料,其中“尼克松访华日记”披露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。

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,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。我只讲了三分半钟,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。我一开头说:“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,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。”接着我念了一个关于访问北京的公告。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。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,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。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: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,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。但是,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实际上的关系,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,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。

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。两天以后,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,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。他还暗示,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。

1970年10月25日,巴基斯坦总

统叶海亚·汗来看我,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“叶海亚渠道”,要求他作为中间人为对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。

我在第二天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,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,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。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,这就是“罗马尼亚渠道”的开端。事实上,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。

1971年年初,周恩来给我捎来一封信,内容如下: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,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。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,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。

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,语气温和,没有骂人,使人感到放心,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,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。

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,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,飞往中国,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,抵达北京。

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,我们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。我略停一下,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。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,一边向他走去。当我们的手相握时,一个时代结束了,另一个时代开始了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伍任/文

